



東坡選集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东坡选集

一九八七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徐永年
曹慕樊
主编

责任编辑：蔡行端

封面设计：曹慕樊

东 坡 选 集

曹慕樊 徐永年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4.5 插页7 字数620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18·1032 印数：1—3,800

定价：5.20 元



宋人画苏东坡像

醉瓦

一夜尋黃居寀龍不獲方悟半

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須

一箇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

此告子細洗与後取得印物是

却寄團茶一餅与之旌其好事

也

秋白

季常

廿三

苏东坡手迹《一夜帖》

東坡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
 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麋鹿走今朝橫江來一
 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屨輕重阜去人曾幾
 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
 欣有得芝朮在蓬萊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塿
 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雖離見吳宮葦葦莫
 楚數空傳孫郎石無後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

宋本《東坡集》書影

宋刻本“三蘇文集”書影

東坡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策別下進策
 策別十三書費用
 原貨財者其別有三其曰書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書財之與文
 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
 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
 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義也肉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
 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乎故人厚之於天下俯已
 以使人則易為功仰人以難為力其貨財最客費用不如節用
 以廉取之為易也且謂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天下其病固將倍
 之資不過計其衣食之費為學之舉出入於一金之中竟然而有餘及
 其且積積蓄聚米食既足則意之欲日以漸廣力益而於後益
 以不驗不察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夫以富而貪富富



东坡墓（墓在河南郑县茨芭乡）

序 言

徐永年

一部选集要编得好，确非易事。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1〕。尤其是东坡的作品丰富，内容深广，风格多样，一生都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而身后的影响又非常深远，要想选出少部分作品，做到具体而微，不离本真，不致对东坡的形象有所歪曲，就必须在研读东坡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排除一些成见，特别是对于东坡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那些一刀切的说是道非，尽可能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庶几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从东坡生前起，到现在将近千年，他的诗、文、词、书、画都享盛名，被公认为全面的文艺家。然而，这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童年时努力读书作文，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当政治家才是他的第一志愿。同时的和后世的对他真有认识的人，都首先从政治上来评价他、称颂他。他死后，李方叔的祭文说：“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被当时广泛传诵。他的老弟苏子由写他的墓志铭，固然充分赞扬他的文学成就，但主要还是记述他政治上的言行，从政治上去落实他的历史地位。陆游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3〕。也是从政治上赞扬他的立身大节。东坡的文艺，实是他

的政治之余。只有先从政治上认识他，才能进一步认识他的作品。

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宋朝便种下了积弱积贫的根苗。经过七八十年的文恬武嬉，百病丛生，地主阶级中有远见的，如范仲淹这样的人，力图抵御外侮，消除内忧，在庆历年间尝试革新。虽然没有成功，但确激励了来者。王安石与苏东坡在北宋，都不愧为卓尔不群之士，都在青年时便有志于改革，都要为地主阶级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两人的初志，在根本上并无不同。王安石四十八岁还朝，便越次入对，五十岁正式拜相，实行变法，颁布了财政、军事、吏治、文教等方面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得遂平生志愿，成了政治家。不管客观上的评价如何不同，他首先是个政治人物，则古今俱无异词。可是，东坡却不然。由于他始终没有登上宰相的地位，更由于他在王安石变法中成为反对派，于是，愈到后来，人们就更多地看到文艺上的苏东坡，不大多说政治上的苏东坡，演变到近几十年，甚至从政治上否定了他。这真是他的不幸。他一生那样热心政治，政治却在生前身后都加害于他。在生前，他不但被贬斥到黄州、惠州、儋州，而且更遭到乌台诗案那样严重的政治迫害。死后第二年他便被列入“元祐奸党”。作品遭禁毁，子孙受打击。南宋以后，恶名才得到昭雪。但是近三十年来，几部流行的文学史和一些评论，很少有从政治上肯定过他，有的甚至给他扣上“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代表”、“守旧派”甚至“反动派”等类的帽子。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苏东坡更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可是，这不幸也毕竟有限得很，无论如何也毁坏了东坡这个在我们历史上有光辉贡献的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

古流”！

我们认为，东坡是个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进步的标准，主要是看他对待人民的态度。是否政治家，主要不在于政治地位，而在于其人的政治见解，更在于实际的政治行为。东坡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虽也瑕瑜互见，但主要倾向却是应当肯定的。他在仁宗朝献策认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4〕。这与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的精神一致，保守的帽子当然戴不上。问题是出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的《上皇帝书》一类文章，成为划他为保守派的钢鞭。这种划派，是以完全肯定王安石变法为前提的。论断虽勇敢可钦，却近于鲁莽。

自宋以来，对于王安石变法，毁誉皆有。大抵空洞的褒贬多，具体的分析少，仍有待于今后深入的探讨。但在近代却是褒多贬少，甚至有褒无贬，其源盖出于梁启超。梁氏在蔡上翔书的基础上，附会欧美政治，敷衍成《王荆公》一书。耳食纷纷，俨成定论。变法的问题尽管复杂，但有两点却很明显：一是新法方面虽多，主要还是财政。如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免役法、青苗法，部分地区施行的均输法、市易法等，目的都是增加封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聚敛的结果，大地主阶级固有所损，贫民下户受害更多。原因是官僚机构本身腐朽，用意虽然甚善的法令也要变质，各种税钱都强行“抑配”（即摊派）到老百姓身上；同时，大地主阶级的负担，最后还是转嫁与贫苦农民。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只不过是句天真而漂亮的谎言。二是推行新法所取得的实效，占全国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究竟得了多少好处？确实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梁启超那样

偏爱王荆公，在叙述“新政之成绩”时，实亦难于下笔，在不得不承认青苗、市易诸法无成效可见后，只好抄荆公的《元丰行》等诗，聊以完篇。荆公本人头脑相当清醒，并不曾一味吹嘘他的政绩。他在熙宁八年（1075）再次拜相的诗：“膏泽未施空谤怨，疮痍犹在岂讴吟⁽⁶⁾”？看到新法行了几年，问题依然严重。至于新法害民的具体情况，见于宋代各种记载者，到今天也很容易找出一大堆，很难说这都是反对派造的谣。因此，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肯定，进而对变法的反对派作全面的否定，是违背历史的客观实际的。鲁迅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半当真半取笑⁽⁶⁾”，确是言简意深的持平之论。

在熙宁前期，东坡几次反新法的政论，动机并非出于一人一家之私，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家庭出身和经济状况言，东坡不能与王安石比，就政治地位言，更不能与王安石比。位卑而名高的东坡兄弟，在当时若要希图富贵，用不着象吕惠卿那样巧合逢迎，只消随声附和，乃至默不作声，就可以平步青云。东坡起而论争，也确出于维护整个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东坡反对新法的意见，结合历史实际分析起来，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偏激片面的意见，对新法的积极方面，如免役法较差役法进步，青苗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不但不作正面的肯定，且对消极面有所夸张，甚至认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⁷⁾。”二种是东坡所预言新法的弊端，多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又多得大体。如他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失在任人”，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⁸⁾。拿现在的话来说，东坡认为政治的好坏在于干部，要推行一套政策方针，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这问题不先搞好，便匆匆忙忙地变法，必

然要失败。这意见当然是可取的。第三种是苏、王二人在国家经济某些问题上认识不同，比较之下，东坡无疑更进步一些。东坡认为当时的赋税已很苛重，王安石则认为“古之取财亦岂但十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⁹⁾”。这是搬教条做挡箭牌，不顾事实。东坡反对由封建政府专卖而损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均输法”，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正是东坡较之王安石更有民主精神的地方。

东坡从一开始，在事实上也并非彻底反对变法，现在看来，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目的而在于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在争论中自然也夹着一些意气，加以他笔锋的锐利，结果反使人忽略了他的正确成分，招来了一些怨恨。可是，东坡并非只会摇唇鼓舌的政客，他之难能可贵处，在于他始终能着眼于广大人民，从客观实际出发，提高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的错误。他在元丰七年（1084）与滕达道书：“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于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疎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取；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¹⁰⁾”。这是给老朋友私信中态度诚恳的自我批评。就这气度而言，已远远超过王安石。乃至司马光。由于他的认识能从客观实际出发，更加以他一贯正直不阿的品格，所以他就不随风转舵，轻易放弃自认为正确的看法。神宗死后，司马光入相，尽废新法，东坡却反对恢复差役法，甚至在朝堂激烈争执。当此之时，东坡只要稍加附会，是完全可能爬上宰相地位的。然而，他根本不作此想，这正是东坡之所以为东坡。

东坡政治品格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位实干家，每到一处，都尽量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在徐州任上，亲自组

织指挥防洪，修城筑堤，奋战了两个多月，终于战胜洪水，保住了徐州城。又亲自去寻找煤矿，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在杭州，他做了更多的于人民有实惠的工作，疏浚西湖，修复增设水井，整治运河，积极救灾，捐出自己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兴办公共医院等。在颖州，他也兴修水利，赈救灾荒。在定州，积极讲武备边。在冗员甚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很低的宋代，象东坡这样惠政之多，成效之著的地方官，确是少有的。即使在被贬斥的地方，无权无责，他仍然念念不忘做好事。他在黄州看见贫苦人民常常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他不但写信与鄂州太守朱寿昌，介绍他在密州筹措公粮来收养弃儿的办法，而且还与黄州当地人士成立育儿会，自己也捐钱来收养弃婴。在谪迁岭南时，他每到一处，都热心推广木制插秧机——“秧马”，意在减轻农民插秧的劳苦。在惠州，又介绍四川的水碾，促进生产的发展。又力助博罗大火灾的善后事宜。建议广州为人民改良饮水。在儋耳，他讲学论文，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教。这些确凿可考的事迹，说明东坡真有精明的政治才干，真有民胞物与的精神。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¹¹⁾”。我们看东坡，且不论他的政论的是非曲直，即凭他的政治实绩，他也不愧为进步的政治家。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¹²⁾”。我国古代诗人人格高尚伟大者，是否仅此四人，当然还可讨论，但王氏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重视文艺家的人格，并以之作为衡量文艺家在历史上地位高下的尺度，正是我

国文艺理论批评的优良传统。我们上述的东坡的政治实践，正体现了他的伟大人格。而他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人们的崇敬，又还不止于此。东坡的为人处世，够得上说是“明济开豁，包含弘大。”他总是以善意来对待世间的一切，他自己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¹³⁾”。尽管挨整了多次，至死也没有改。所以，他有两点表现得很突出。一点是他胸怀浩落，对不同观点的，乃至曾加害过他的人，能在政治上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但不搞打击报复，而且还顾全国体，曲予救援。他与王安石，政见很对立，在王的生前死后对王都有不少激烈的批评。但在王晚年罢相住金陵，东坡在元丰七年（1084）离黄州东下，路过金陵，特去看望他，流连旬日。“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之五）。足见荆公喜欢东坡，约他做邻居。又据《邵氏闻见录》，此次会见，东坡还责怪荆公不该不问政治。对政见上如此对立的人，能勉以大义，这是何等胸襟！荆公死后，东坡所撰赠王安石太傅制词，也比较公正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又如，蔡确是制造乌台诗案的重要人物，东坡对这个专好整人的家伙当然是厌恶的。元祐年间，蔡确被贬到安州，写了《夏日登车盖亭》十首诗，被人告发，指为诬蔑太皇太后。这时，东坡不但不落井下石，而且密上奏章，请求不予追究，赦免蔡确。在当时倾轧成风的党派斗争中，东坡这样的政治品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原是好友，后来又整了他的章惇，他也采取了宽厚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他已重病时，章惇的儿子又是东坡门生的章援出于利害观点，也带着几分内疚写信给他，左弯右绕，嗫嚅不清。东坡回信却是光明磊落：“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按惇时谪雷州），

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¹⁵⁾”。刘后村评论苏、章关系，说：“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愤悻，必致之死；小人负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怜，犹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欤⁽¹⁶⁾”。关于章惇的历史功罪可以另外研究，但就苏、章关系看，品格高尚的确是东坡。

另一突出之点，就是东坡门庭广大，爱护人才，奖拔后进。在这点上，他确是很好地继承了他的老师欧阳修。在事实上，他是欧阳修之后的当时文坛领袖。这个地位并不随他在政治上穷厄而改变的原因，固然由于他卓越的文才使人折服，同时也由于他始终热心扶植后进。一面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另一面平等宽容，善见人长。经过他的指教和延誉而在文学上自成一家的，便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陈师道、李廌、李之仪、唐庚等十余人。这些人对东坡都由衷敬爱，终生服膺，有的因东坡而被牵连遭贬，吃了许多苦头，亦终无怨言。这不是以利禄为黏合剂的宗派小集团所能办到的，实是东坡的伟大人格有以感召他们。还有些人虽然不算东坡的门生，但事实上也受了很大的教益。其弟子由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文同、王洙、李公麟、米芾等杰出的画家、书法家，也都得到东坡很大的帮助，后世的人们也从东坡的有关诗文中而对他们的艺术成就有深切的认识。东坡对他的前辈欧阳修、梅圣俞，终生都抱着敬意。对于朋友和后辈，总是嘉善而矜不能，凡有寸长片善，到处说项，尽量表扬；见到短处则善为譬喻，耐心开导。他不像韩愈那样在李翱、皇甫湜等面前摆老师架子，更不像王安石“好使人同己”，“苏门四学士”的风格并不象东坡，而是自由发展，各具面目，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世之才固然可贵，而这才能充分发挥，作出更

大的贡献，还得有赖于伟大的人格。

东坡伟大人格的形成，主要是两个方面。他出身于并不很富裕的布衣之家，自幼受着父母的良好教育。苏洵这位博通历史而注视现实的政论家，剴切的议论中带着正义感。他对当时的阶级矛盾有清醒的认识，如他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7〕。便把土地的高度集中，地主剥削农民的苛重揭露得很明白。苏洵的思想对东坡兄弟有很深的影响。东坡十岁时，他母亲教他读史书，便勉励他学后汉的范滂。这样的教育，使他在少年时代，便有志于用世，且对社会生活开始有真切的认识。他看到“蜀人衣食常苦艰”，贫苦农民是“野人喑哑遭欺谩〔18〕”。他更看到封建国家无法解决的矛盾：“富者地日以富，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19〕”。到了入仕不久，即遇上王安石变法，由于站在反对派的立场，头脑就不象当局者那样主观，加以长期作亲民之官，便对新法的利弊更能体察，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继而谪贬黄州，生活空前贫困，被迫从事体力劳动，自救饥寒。至于“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20〕”。这样的困苦，倒是玉成了他，使他的思想感情与广大劳动人民发生了深刻的共鸣。一场大雪，他想到的是“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21〕”。久旱不雨，他念着“我虽贫困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22〕”。在尔后起复作官时，总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解除人民的痛苦；而力所不及也就产生了深刻的内疚：“报国无成空白首，退耕何处有名田〔23〕”。具体的社会实践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使

他超越了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褊狭，而具有忧世济民的博大胸怀。

另一方面则是东坡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儒、释、道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都很鲜明。这也是时代的风尚使然。王安石也是个兼取佛老的儒者。两宋的一些理学家，以儒家的道统自任，貌似纯儒，实又暗取禅学。可是东坡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便大为理学家们诋毁。朱熹说“（苏、王安石）二公学皆不正”。王夫之骂“苏氏荡闲踰检”。理学家们攻击东坡，并不奇怪。东坡说程颐“不近人情”，倒是很确切的批评。理学家们视为异端的东坡思想中，正包含着东坡本人并不自觉，而在客观上对封建正统思想起着冲击破坏作用的具有民主性的因素。

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都是庞杂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承受这些前代思想材料的人，又随着不同的时代条件而各有取舍，表现出许多差异，起着不同的作用。东坡兼有儒、释、道三家，实也只是各取了一部分而自具面目。从他所著的《苏氏易传》和一些文学作品看，他的本体论有唯心主义倾向，但涉及历史和现实问题，又常表现为唯物主义，并有着一些符合辩证法的思想。他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没有用主要的精力去探求抽象的哲理，他的思想注重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因此，儒、释、道三种思想，对东坡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中的进步成分。他强调儒家思想富于民主色彩的因素，赞扬“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²⁴⁾”。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成为他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他说：“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²⁵⁾”。把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验诸行事，也确实如